

会计准则制订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

○葛家澍

(三)我国基本会计准则中可资研究的问题

用西方概念框架的特点来同我们已颁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比,可以看到现在的《企业会计准则》一方面借鉴了西方概念框架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准则的内容,是概念框架与准则的结合体。基于这一考察,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作为基本准则有如下可资研究的问题。

第一,在第一章总则中,基本上反映会计的基本假设;在第二章中,一般原则反映了会计的基本原则;从第三章开始到第八章讲的是会计要素。但《准则》中缺乏会计概念框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目标。有人认为,在《准则》的第二章第十一条中也谈到了目标。这一条指出:“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但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果说这是目标,就不应把它列入一般原则的第二项。一般原则的第一项即第十条是讲可靠性,而第二项即第十一条则很多人把它理解为相关性而不是理解为目标。二是如果是讲目标,却没有详细指出信息的三个方面的使用者:国家、有关各方和企业本身究竟需要什么信息。特别是后一问题,假定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是会计目标之一,那么,会计目前应如何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如何明确用来满足国家宏观管理需要的具体信息?会计是一个微观的经济信息系统,它是很难直接满足宏观管理需要的。因为它

是以企业作为反映主体的,它不能反映整个国家的财务状况(财政状况)和财务收支。因此会计要满足宏观管理的需要,还必需经过综合、加工、筛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要不要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答案是肯定的。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调查研究。要研究:会计的信息怎样同宏观管理的要求联系起来?这里一方面需要加工,另一方面还可以提出国家基于宏观管理的需要,而要求企业提供特定的信息,如为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可以要求企业提供有关这方面的特殊信息;为了控制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可以要求企业提供有关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的特殊信息,而这些信息同样需要加工、汇总,不汇总是不能满足宏观管理的需要的。因为国家宏观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往往是总量指标,不是单个企业的信息。又如第十一条假定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包括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全部信息,至少应把成本报表和与成本报表有联系的其他内部管理会计报表都包括进去,但在第九章会计报表中就没有这部分报表。至少第十一条的要求与后面报表的构造是脱节的。所以《企业会计准则》的一个很重要的缺点是没有很好地研究财务会计的目标,不从目标出发,其他一系列概念研究就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

第二,我们借鉴了国外的概念框架,但在借鉴之前没有认真地研究概念框架的性质、作用 and 特点,没有认识到概念框架的性质是属于财务会计理论,是制定准则的基础。从第

三章到第八章的会计要素准则,如按西方的概念框架,一般只讲要素的定义和特点,即给要素下一个完整的定义,然后分析每一个要素的特点。比如:什么叫资产,资产具有什么特点?什么叫负债,负债具有什么特点?而我们对资产的定义从历次的修订稿来看,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是不够的,开始几乎没有了解为什么在概念框架中要对要素下定义。我认为在概念框架中之所以要对要素下定义不是为了下定义而下定义,而是为了要指出要素的基本特点作为确认的标准。由于对资产的定义还不完整,这就影响到确认为资产的项目的科学界定。现在,在《准则》中,对资产下的定义是:“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但却没有提到作为资产的经济资源必须是带来可能的未来(不是现在,更不是过去)的经济利益,而能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是资产最本质的东西。任何一项资产当它还是资产的时候,现在只是占用,而带来的利益却是未来的,如果它已带来经济利益,那么它现在就不再是资产而转化为费用了。资产和费用的区别就在这里。如存货是资产,当存货被加工使用之后即被消费之后,被生产消费的存货部分就变成了销货成本。当固定资产还没有使用的时候是全新的固定资产,现在不会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它是未来的经济利益;当它被使用之后,转化为折旧的费用则已带来了使产品价值增值的经济利益,未折旧的部分才是未来的经济利益。未来的经济利益和已实现的经济利益则分别表现为资产与费用。相反,我们在定义“资产”时把不应该放在概念框架中的东西也放了进去,如资产分为固定资产、流动资产、长期资产等;接着又指出流动资产包括些什么,现金应该怎么记帐,短期投资如何记帐,甚至具体到应收帐款可以计提坏帐准备,坏帐准备应在报表中作为应收帐款的备抵项目来列示等具体的会计处理。这些都不是概念框架的内容,而是具体准则的内容,这样,概念框

架的普遍指导作用却被降低了。在概念框架中列示越具体,基本准则作用的范围就越小。

西方概念框架的特点是它不具体说明具体项目如何确认,而是只提出所有要素确认的共同标准,不说明具体项目如何计量,而只说明计量有多少属性(如有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市场价格、公允价值、可变现价值等),并对这些属性作出说明,指出它们在什么场合下才可以适用。其好处在于它能为制定具体准则提供参考。具体准则由于比较实用,允许经常修改,概念框架一般是不经常修改的。美国的概念框架第6号代替第3号,并不是修订,而实际上是将它的适用范围扩大化,把原来应用于企业的要素扩展到包括企业和非企业单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概念框架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修订,但1993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则全面地修订了10个已公布的会计准则。总之,我国目前的《企业会计准则》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明确会计的目标;二是借鉴概念框架时,把两种不同层次的规范——具体准则和概念框架混合在一起了。我们要求的基本准则应该起到概念框架的作用,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

二、基本会计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

基本会计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的关系看起来似乎只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即:基本准则指导具体准则,或规范具体准则。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此简单。

历史地看,每一个具体准则都是根据需要而制定的。每当产生了新的经济业务,出现了新的会计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处理这些经济业务,就需要制定和修订具体会计准则。因此,基本准则并不能指导或决定需要制定哪些具体准则,以及制定多少具体准则。这与在基本准则内部,比如说通过基本假设可以推导出一般会计原则;或者通过目标可以确定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并且影响了会计的要素这样一系列的必然联系是不一样的。

基本准则当然地对具体准则具有指导作用。

第一,在制定一个具体会计准则时,必须用目标来指导方向。每一个具体会计准则都应体现财务会计的目标。具体地说,都应该通过特定的经济业务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

第二,具体准则所采用的术语、专用名词,凡是与财务会计要素有关的,特别是会计要素的进一步细分,如:资产是财务会计的第一个要素,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应收帐款等就是资产要素的进一步分类,这些分类往往就构成具体准则的专有名词即术语,对这些专有名词的定义都不能偏离要素的定义。举例来说:我们在《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外的概念框架中都把“资产”大致定义为:一个企业通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拥有的或可供支配的(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这个定义在总的方面应规范与资产有关的所有具体项目的定义,如作为无形资产的商誉,是资产的组成部分,对“商誉”的定义就不能离开对资产定义的总的框架。我国最近公布的无形资产征求意见稿中对商誉这个术语的定义是:“企业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就出现这样的问题:(1)能力是不是资源?我们是把资产定义为资源的,商誉也是资产,为什么又定义为“能力”?(2)获得这个能力是否要通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这两个问题都不明确,这就偏离了我们对资产的定义。如按这个定义,自创商誉也可以确认了,因为自创商誉也是一种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尽管它没有通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因此,具体准则的制定必需考虑基本准则中的基本概念,特别是要素的概念。

第三,具体准则是对会计的确认、计量、报告结合特定的具体业务加以规范的具体化。会计的确认、计量、报告都不是抽象的,它们都必须结合某一项具体业务如存货、应收帐款、外汇、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业务才可

以看出是如何确认和计量的。这一点也表明具体准则要服从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在确认、计量、报告这几个方面,从总的来说都不应背离(稍微有所偏离是可以的)基本准则所确定的一些基本要求。

第四,具体准则尽管要服从基本准则,但由于基本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具体准则是不断地根据新事物的发展而发展着的。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往往需要根据具体准则的发展情况反过来修改基本准则。我国就面临这一情况。究竟是应该根据已公布的基本准则把具体准则统一起来,还是根据具体准则中应有所发展的新内容(中国国情与国际会计惯例的更好结合)来修改基本准则?毫无疑问,应该走第二条道路。因为已有的基本准则无论从思想认识,还是从具体情况来看,当时都还不允许我们更多地借鉴国际惯例。谨慎(稳健)原则的采用最有代表性。当时在制定基本准则时对此争议很大。当时有人认为,如果承认谨慎原则,则将导致会计人员弄虚作假,因为他们可以用谨慎原则作为借口来降低利润,提高成本,其结果可能减少国家税收,影响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同时,谨慎原则从会计信息来说与一致性是相矛盾的,如存货允许在期末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来表现,这显然就与实际成本相背离,致全部存货或分大类的存货或分小类的存货所采用的计量属性都不一致。所以当初在《企业会计准则》中虽提出谨慎原则,但运用时却有所控制,如:存货流动允许采用后进先出法;应收帐款只允许按年终帐面余额的规定比例提取坏帐准备;固定资产要经过批准才可以采用加速折旧法等。而最能体现谨慎原则的成本与市价孰低规则当时却没有被采纳。现在,“存货”具体准则的征求意见稿规定期末的存货可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因为这个准则是多年来的国际惯例,它确实会带来上述的两个问题,但总的来说,由于企业是在一个竞争很激烈的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竞争就

会带来风险。所以,要允许企业采取谨慎的政策,即不预计或少预计可能的收益,而要预计一切可能的损失来保存实力,以便更好地应付挑战,抓住机遇。总之,这样的一个惯例,实际上是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而产生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具体准则往往先个别地突破了基本准则的规定,当具体准则的突破具有普遍意义时,反过来就要修改基本准则了。在国外就必须修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例如:从计量来看,历史成本是世界各国长期以来普遍采用的计量属性;在历史成本原则下,资产的取得按照交换价格入帐,以后如资产不加以处置,即不更动帐面价值,这样就省去很多会计处理的手续。因此在市场价格比较稳定的情况下采用历史成本是合适的,它既容易被会计人员接受,在会计处理中又符合成本低、效益大的原则。但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比如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比较激烈的持续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坚持按历史成本来提供信息,显然这种信息就不可靠了。失真的信息不但对决策无用,而且贻害很大。这样,具体

准则、基本理论都要相应地作些修改。所以,在六、七十年代,很多国家制定了物价变动处理的会计准则,如美国的第33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同时出现了一些物价变动会计理论和通货膨胀的会计模式,特别是现行成本理论和方法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还相当流行。这些都是客观经济现实的需要,具体准则往往对活跃的经济现实起敏感的反应作用。在具体准则中先通过某些业务、某些问题的会计处理反映客观现实的要求,当这种业务日后逐渐普遍以致需要理论来指导时,就要求修改基本准则,使会计理论和会计观念同它相适应。

所以,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的关系应该是互助、互补的关系。总的来说,基本准则指导具体准则、规范会计制度;但在一定时期和特定的情况下,具体准则也会反过来促进基本准则的修订和完善。不管是具体准则还是基本准则都不是凝固不变的系统,两者都处在不断地变化中,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展,它们始终又是相互依存的。

—————
(上接第47页)

人,不怕有压力,向领导建议加强防范意识,并拟定了担保审批制度,规定了担保的条件,妥善处理了担保和 risk 的关系。

2. 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我在工作中不仅对国家、企业的资产严格监控,同时也时刻提醒自己要洁身自好。我信奉的宗旨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牢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董事会任命的总会计师,是股民委托我掌管钱财。我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坚守财经纪律、用来当家理财,决不能用来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我也时常给公司财会人员讲述职业道德和廉政意义,要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始终把握住自己,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3. 防患堵漏、强化监督。股份公司刚改制后,财务改革一度未跟上,我立即向领导建议应根据股份制的特点和要求,建立新的财务管理体系,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行改革,使所属子公司和企业

与总公司保持一致性。总经理接受了我的建议,明确指示把财务管理作为总公司内部的“第一管理”,并强调党委对企业是定性监督,财务人员对企业应该是定量监督。从那以后,我经常从财务和效益的角度提供详尽的分析和预测,并定期召开会议,反映、汇报、交流、沟通各企业的经济活动情况。同时健全内部审计,为各级领导正确决策、改进管理及时提供情况。我认为会计监督不只是事后被动的反映,而应当是一种能动的、贯穿于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管理活动。因此要想发挥好监督职能,就要增强参与意识。我力求改变过去只纠偏、不促进的传统监督方法,而注重在参与中加强监督、在支持下予以引导。

会计是个很辛苦的职业,总会计师是个很难做好的岗位,但既然我已选择了会计这一行,我就终生不悔。

(作者是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本文摘自
上海市会计“双先”表彰大会交流材料)